



□ 耿 凡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年），是20世纪俄罗斯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家，曾任苏联国家总统顾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等职。李福清治学严谨，学术精深，精通多国语言，尤其钟爱中国民间故事比较研究，发表各类研究成果300多种，取得了享誉世界的学术成就。李福清热爱中俄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在全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获“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等多项大奖。

结缘汉学研究

李福清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受伯父东方学家阿·巴·里夫京的影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李福清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由于学校缺少中国教师，学习汉语口语成为李福清面临的主要困难。1951年，李福清来到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的米粮川回族村学习汉语，该村是19世纪从甘肃、陕西迁至吉尔吉斯斯坦的回族后裔，在语言上依然保留着甘肃、陕西方言。这段经历不仅使李福清提升了汉语水平，也使他开始接触中国民间故事，了解了《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故事的情节，对这些故事深深着迷。

1955年，李福清大学毕业进入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组从事研究工作，他将研究重心放在孟姜女故事上，探索这一故事在口头传说、民歌、地方戏等不同体裁中的具体表现。1961年，李福清发表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取得副博士学位，该文赢得了中国、苏联、意大利等国家学者的广泛赞誉。

1962年，李福清从民间文学研究组调入东方文学研究组，该部门不同意李福清从事单纯的民间文学研究，他转而开始探索中国的历史演义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确定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搜集资料深化研究，1965年李福清来到北

京大学，跟随民俗大家段宝林学习。1970年，李福清发表他的三国研究成果《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取得博士学位。1970年代前后，李福清进一步开拓视野，将蒙学、朝鲜学等东方学纳入自己的研究，注重挖掘远东地区文学的区域性联系。这些研究奠定了李福清世界级汉学家的学术地位。

1980年代以后，李福清的学术研究进入成熟期，在拓展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年画研究等新的研究领域。1980年代，李福清将老舍、叶圣陶、钱钟书、冯骥才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俄文出版，同时探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根源。2000年以后，中国年画研究成为李福清的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年画与民间传统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研究等方面，发表《中国民间年画及其研究问题——融入民众生活的艺术》等著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

把民间故事作为研究主线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以中国民间故事为主线，涉及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民间年画、比较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

李福清大学期间受到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后者将中国民间故事理解为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李福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理念，他在对中国民间故事的各种体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民间故事与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内容进行比较，挖掘民间故事背后现实的历史背景，深刻解读民间故事情节中的语料内容，还原民间故事的社会文化语境，开辟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

李福清的汉学研究，以海量详实的资料为基础。李福清认为，研究任何主题都要尽可能穷尽各种资料，为此他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民间资料，同时吸收借鉴古人和今人的研究成

果。例如，在研究孟姜女故事时，他为了搜集散落中国各地的资料，向中国各省文联写信求助，得到了各省文联的积极响应，收获许多新资料，推进了相关研究。李福清还注重海外中国文献的收集和**研究**。1962年，他在列宁格勒研究所整理文献时，意外发现1832年中国《石头记》抄本，发表《新发现的〈石头记〉抄本》一文，为红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李福清善于发现学术问题，他的研究常常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学术争论问题开展。例如，他的《三国演义》研究是为了解决关于中国说书问题的学术争论：三国说书究竟是依据口头传统还是章回小说。李福清通过分析，系统比较《三国演义》与苏州、扬州等地说书人的评书记录，最终证明现代说书人的评书用的都是清代文学批评家毛宗岗的《三国演义》修改本。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李福清的研究中还有很多。

李福清非常重视细节研究，常常从微小的细节中得出结论。例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李福清比较《三国演义》和说书中“周瑜看病”的故事，发现小说中该故事由26个动作组成，而扬州评话艺人康重华说书中该故事则由109个动作组成，得出口头说书往往把动作和情节分成更小的情节单元的结论。李福清的这些研究，既具有一般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也极具个人特色和魅力。

以整体观方法研究中国文化

李福清能够掌握和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文化，同时对这些研究方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李福清特别注重以整体观方法研究中国文化。他将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对中国文学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体现为李福清对民间故事、古典小说、现当代小说、民间年画等内容开展的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上，李福清将中国文学置于远东地区的范围内，从中国文化汉字区整体的角度研究远东地区的民间文学和文化。李福清还

从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学角度理解中国文学，要求从世界文学整体中审视中国文学，揭示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这就使李福清的汉学研究具有了宏大的理论视野。

李福清不仅善于收集资料，尤其擅长运用文献学和目录学方法整理资料。俄罗斯汉学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传统，注重运用文献学方法梳理各种资料。李福清大学时代在阿列克谢耶夫、维·彼得罗夫等老师的指导下，逐步掌握了运用汉学工具书查阅资料、开展研究的方法，并对这一方法本身产生了浓厚兴趣。李福清的文献学方法，不仅将收集的各种资料分门别类，编著不同专业的研究词典和目录，而且还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其中，指出各类文献的优缺点。文献学的方法不仅使李福清的中国文化研究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也形成了大量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成果，出版包括《苏联几个大图书馆的东方藏书》《中国文学典籍目录补遗》等著作几十种，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借鉴。

李福清还将形态学、历史诗学方法相结合，形成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形态学注重共时态研究，关注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运用这一方法，李福清常常将故事或文学作品区分为若干个情节单元，发掘蕴含其中的母题。例如，在三国研究中，李福清选取比较《三国演义》《三国志平话》《花关索传》等著作中张飞长坂坡断桥的情节，指出这些情节中蕴含了勇士声音物质化的母题。历史诗学的研究方法则注重历时态研究，清理故事或文学作品的发展演变过程。例如，在三国研究中，李福清注重探索三国故事在历史上的流变，区分出史实记载、史诗故事、口头传说、元代戏曲、演义小说等几个发展阶段，探究其中蕴含的规律和特点。

这些具有传承性和创建性的研究方法，不仅使李福清中国文化研究具有科学性，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茶的中文发音对世界“茶”发音的影响

□ 吴敬南

纵观世界历史，茶一直活跃在对外贸易和交流活动中，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文化符号。茶，是中华国饮，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茶叶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国茶文化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这在茶的中文发音对世界各国语言“茶”字的影响中，可见一斑。

我国茶的中文发音，大部分地区是cha，但不同地区的方言也有不同的读音，一般只限于茶叶生产地，例如在闽南语系（汉语的一支）中，茶的方言发音为te。在世界几大语言体系中，“茶”的发音均来源于中国，主要源于中文发音 cha 和 te 这种读法，因而，在国际上“茶”字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即源自于我国北方古代官话中的 cha 和闽南语系中的 te，可谓“一叶影响世界，一声影响外语”。而这种语言传播现象，又与历史上中国茶的陆路、海路两大传播渠道密切相关。

在古代，茶叶最早从中国传向世界各地有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世界各地“茶”的发音，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引进茶叶的方式。通常按陆路引入发音 cha，海路引入则发音 te。偶尔也有例外，例如最早到达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虽然是海洋之路的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但“茶”的发音则按广东话发音为 cha。另外，世界上有极少数

民族对“茶”有自己的单词，这些地方通常是茶叶的原产地。

茶叶陆路对外传播主要包括茶马古道和万里茶路两条贸易路线。从唐代开始，茶成为中国人的“国饮”，并成为经由西汉开辟的古代丝绸之路远销世界各地的核心交易物。在中国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中，茶叶跟随丝绸等货物一起进入中亚、西亚、南亚乃至非洲地区，因此就有了亚洲乃至非洲一些各国“茶”的读音的相似和趋同。比如，波斯语（现为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乌尔都语（现为巴基斯坦国语）、印地语（现为印度官方语言），甚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斯瓦西里语（现在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的官方语言）的“茶”字，都是汉字茶的音译，发音源自于cha。

万里茶道，则是从17世纪后半叶起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茶叶经陆路输出至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路径。万里茶道由清代晋商开辟，专门用于茶叶运输。这条古道跨越了今天中、蒙、俄三国，通过万里茶道，茶文化与茶叶一同输出，使得亚欧大陆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进行了交流与融合。因此，在俄罗斯和蒙古国文字中的“茶”，其发音近似于cha。

可见，中国茶陆路传播所到之处，茶字的发音多为或者近似于cha。

相较于陆路传播的稳定甚至平淡，中国茶的海路传播，则有更多的变化和传奇色彩，也从另一个层面深刻影响着传入国家和地区语言中茶字的发音。

最初，经由郑和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外贸易带去的茶依旧以发音 cha 为主。而到了16世纪，随着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仰慕东方文化的西欧各国纷纷派遣商队与中国互通有无，而茶作为备受欢迎的核心贸易品，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贸易最为积极的便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原本以澳门为交易点，澳门茶的发音为 cha，所以在葡萄牙语里，“茶”发音为 cha。北非地区一些国家语言，受到临近国家葡萄牙的影响，“茶”发音也为 cha。

时至近代，随着欧洲人海上扩张海洋贸易兴起，英国人打开中国国门，迫使清朝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地设立港口。而厦门、福州和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港口主要出口福建茶，受闽南语系中茶的方言发音 te 的影响，te 这个音就沿着这条海上贸易线路，被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沿用下来，并且带到了他们各自的殖民地。

因此，在茶叶从中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各国，其“茶”字的音形多为或近似于闽南语茶字的发音 te，如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为 te，德语、芬兰语为 tee，荷兰语为 thee，匈牙利语、英语为 tea。

在西方早期来华的探险家、商人，甚至在清廷任职官员的相关著作中，也多见反映 tea 与中国茶字之间关系的记载。比如，先后在北京、厦门等地海关任通译和税务的英国人包罗在其著作《厦门》中，就记载了英语 tea 与厦门方言 te 之间的渊源——“tea 这个字是从厦门的方言 te 字而来的”。而在此之前，19世纪在厦门生活的美国人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 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茶’ tea……”。

与此类似的翻译现象还有乌龙茶的英语译名 oolong tea，工夫茶被译为 kungfu tea 等，这些都与厦门方言或者说闽南方言有着很深的渊源。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家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精神之要义，蕴含着丰富的安身立命、治国齐家等理念，是家庭文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朱熹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大师和儒学集大成者，其家风家教家训思想在家文化发展史上拥有重要地位，蕴含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涵养社会美德、培育个人品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德修身的个人修养

齐家之要在于修身。个人先修身而后齐家，身不修则家不齐。明德修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朱子家学一以贯之的立学之本。

朱熹早年深受家庭的影响，特别是来自父亲朱松的熏陶。他将父亲题给二叔的“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朱子家训》里讲到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最初是蜀主刘备教导刘禅为人的道理，后被朱熹当作家训传给后人。朱子曰：“善之所在，即当从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他要求家庭成员不要以善事的大小来决定是否有所作为，不能因恶事看起来比较小就放纵自己的行为。

朱熹认为，真正有德之人要做到“四勿”：“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朱熹告诫他的后人：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人、不要做嫉妒贤能的人、不要做因愤怒而伤害他人的人、不要做背弃礼仪而伤害生命的人。与其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他物的痛苦之上，不如实实在在地做到“守我之分”与“听我之命”。家庭成员要注重种德积善，弘扬清风正气，以“不虑于微，始殆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的理念为家训，严格约束自身和家人言行，在丰富自身精神世界的同时，提升个人道德修养。

家庭是个体成员修身养性的重要场所，没有良好家教的引导，子女的思想道德难以树立。朱熹非常重视对子女的家德教育，认为“子孙不得不教”，不仅要教其礼、乐、射、御、书、数，更要教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慎独慎微的修养方法等。只有在小的时候经过日复一日的反躬自省，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严谨的行为习惯，坚守内心之正义，涵养浩然之正气，才能培养出一一种积极向上、独立自主的个性特质，真正达到仁爱、宽厚的境界，成为具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人。

以和为贵的持家准则

齐家之要在于家风之正。齐家不仅需要个体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且要将道德的合理内核推广至家庭领域，以实现家庭乃至家族关系的和谐美满。齐家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是否拥有良好的家风。优良家风的培育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更需要家族世代的传承和弘扬。

《朱子家训》《训蒙绝句》《朱子家礼》等传世之作，均强调家庭成员关系的协调、家庭生活的和谐的重要性。其中的《朱子家训》尤为重视家族不同关系的维系。朱熹认为“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朱熹从儒家伦理出发，形成了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柔”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思想，强调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情感互动，其中隐喻着只有合乎“礼”的家庭关系才能真正建成温暖和睦的家庭。朱熹讲“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要发自内心之“诚”来尊敬师长，与朋友交往要讲究“信”。

中国传统社会蕴含的以和为贵的社会伦理，源于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相处中得出的“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的人际准则。朱熹经常告诫他的后人，不要揭别人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



□ 林鹭航 崔翼

处。这并不意味着把别人都看作嫉妒的“小人”，而是要给别人留有余地。换句话说，是要给别人保留改过自省的机会。

以和为贵是中华文明的价值本色，孔子、子思、朱熹等儒学思想家都认为人性是趋“善”的，每个人拥有“见不贤而内省”的行为动机。朱熹讲“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他区分了“小过”与“大过”的处理方法，一种是谅解和包容的方式，另一种是劝导与帮助的方式，并没有使用比较激烈的斗争方式化解矛盾。

由于朱熹心中始终装着“公心”，能够做到“处世无私仇，治家无法法”，后世弟子将他的为官之道归结为“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四条准则。

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家国一体的大局观念，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由家构成，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

曾参的《礼记·大学》也强调“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意思是“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要调整好自己家族，因为不能教育好自己家族的人反而能教育好一国之民，这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

《朱子家训》开宗明义，明确将个人的责任与家族兴衰和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朱熹立足家族发展教育晚辈，借助通俗易懂的家训点明治国与治家之间的相通之理，蕴含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从个人到家庭直至国家、天下，“家”是一以贯之的纽带，只有家庭和睦，才会有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

朱子家国同理的思想，是中华文明家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认为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命运，从本质上是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强调将个人发展、家庭幸福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将个人价值实现与国家发展进步统一起来。修身齐家、胸怀天下，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为人民和人民尽职尽责，是自我价值的最好实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朱子家风家教家训思想的实践要义，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为人立世、家庭伦理、天下一家的价值精髓。传承和弘扬朱子家风家教家训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对赓续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